

doi:10.3963/j.issn.1672-8742.2018.06.007

仿真学术的幻实之辩

董云川

(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主持人:董云川,云南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

笔谈嘉宾:耿宇鹏,云南大学副教授

陈先哲,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王佩佩,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胡艳婷,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

赵宇琦,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8)06-0060-10

时下学界,人人都在谈论一流,然大学之所谓一流者,虽构成要素繁多,但根本还在于学术之一流。而学术业绩若以数量标准度量,近年来可谓极其繁荣,绝对丰收,形成了古今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对学术研发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蔚为宏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5万亿元,居世界第二,科研人员人均经费高达40.4万元。有报道称,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当前,我国科研方面主要以模仿和跟踪为主,原创性成果较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高层次人才仍然稀缺。”国人对学术研究的青睐与迷恋堪称空前,不仅是高等学府内的人们蜂拥而上,官人、商人与闲人均一股脑地争相结缘“学术”,大家都要涉足“项目”,多少搞点“科研”。对“时代福利”的追逐和“文化资本”的瓜分刻不容缓,上不了车,就到不了站。大众扎堆于原本小众的事业,在堆砌出繁硕成果的同时,亦在创造着学术表演的真实闹剧。项目、工程名目繁多,学术成果应有尽有,编撰著作琳琅满目,刊发论文林林总总。然细品慢酌,不难发现,其中一些甚至是为数不少的论文或研究,仅仅是看起来像论文的论文或像研究的研究,既无论点、亦无突破、更无灵魂,然而却像模像样,究其根本,是为“仿真”的学术垃圾。在仿真的圈套中,学术的本真原型已消解,学术作为真理化身的内在规定性遭到了破坏,学术活动不再象征着探索真理与解释未知,而是异化为一种符号,象征着花样、光环与热点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名望、地位与金钱等。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信息爆炸的时代。电子复制技术在改变知识及学术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异化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技

术拯救了一切,也在毁灭着一切;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也在加剧着人类的退化。精细阅读被快速浏览所取代,筛选记忆被广泛下载所放逐,深入反思被程序建构所掩盖,人们莫测高深、天真活泼、桀骜不驯的思维特质正面临格式化的危机。与之相应,学术研究的创造逻辑让位于电子信息的复制技术,学术原创的思想盛放异化为平庸话语的东拼西凑和信息符号的复制粘贴。学术探索的问题境域及思辨空间被关键词的检索和数据库的扩充所限定、遮蔽,学术成果的“接着讲”“自己讲”的生成逻辑被“照着讲”“仿着讲”的应用法则所替代。严肃的学术研究和深邃的理论探索正蜕化成大众的、休闲娱乐式的文本狂欢,幻化成一场缺乏问题意识、难成体系、琐碎零星的写作竞赛,学术成果不是过于浅显化,就是极度经院化,深陷“处理文本资料,摆弄学术概念,完成规定动作”的处境之中,创作和编撰的界限日益模糊,商人、官人与学人的角色转换真假难辨。

面对新的时代境遇,学人可以谦卑,但学术不能谦卑。本真学术是学人的志向,亦是学人的责任。长期以来,学人们大都沉醉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复制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忽视了知识生产关系的转变。学术的群体狂欢和数量繁荣只会使学术自身走向迷失,不知伊于胡底;只能让我们在热闹非凡的学术镜像中扫得一地鸡毛,在多姿多彩的“活法”之中逐渐步入各种各样的“衰象”。重塑知识生产关系,正心诚意、正本清源、删繁就简,避虚就实,以少取多,无中生有,回归本真学术,才能真正实现学术异彩纷呈、百家斗妍的繁荣气象。

愚在新年寄语中感慨:“大学课堂无比重要但无法度量,高深学术匍匐于指标脚下,真实研究大多变成了仿真研究。换言之,没有人愿意作假,但许多人都在仿真。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有方法可以甄别;而仿真研究取代真研究,却容易瞒天过海。后者的危害更严重!”仿真学术是一个真命题抑或是一个伪概念?仿真学术因何而生、如何甄别、怎样规避直至突围路径?仍悬而未决,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时代命题。

耿宇鹏:理工科视角下的“仿真学术”

当董老师说到仿真学术一词时,我忽然有所触动,近年来萦绕在脑海中的一些想法,似乎有了个出口,思索再三,豁然开朗。董老师从论文数量与质量的反差,引用率及与原创的缺失等方面展开对“仿真”的辨析。乍一听,这类仿真主要存在于人文学科,因为对于理工科的论文来说,至少要做实验、需要有数据支撑,似乎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我自己是理工科背景,近二十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学相关研究,对此感受颇深。

先说前两年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的韩春雨事件,由于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突破,韩春雨因此一夜成名。其后在北京大学举办学术报告,盛况空前,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原本默默无闻的副教授一跃成为河北省科协副主席,并从河北省发改委获得两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和建设项目资助。然而好景不长,半年之后,多名国内外同行发现他们均无法重复

韩春雨论文的实验结果。一年之后,《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布声明称,撤回该篇论文。整个事件急转直下,韩春雨的命运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从曾经的学术英雄变成网友口诛笔伐的学术骗子。直到2018年5月,韩春雨仍然未能重复出当初的实验结果。

韩春雨是在故意造假吗?他的论文是仿真学术吗?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影响力太大,基因编辑技术太重要了——这样的重大技术突破,会有无数人去验证、完善和提升。换句话说,如果作者故意在这种论文中造假,百分之百会露馅。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研究者治学不严谨,错把噪音当作信号,未经严谨核实,急于发表,结果搞了个大乌龙。毫无疑问,这件事本身是一桩丑闻,影响了科学家的公众形象。但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科学从来不排除错误,科学从来都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中进步的。实际上,类似韩春雨这样的事件在生物学发展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韩国的黄禹锡(克隆技术),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干细胞技术),都曾经因为不可重复而被揭露。如果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不能被重复验证,最终被撤稿,这个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学术界的自我净化和纠错能力,正如关羽的刮骨疗毒,这种自净机制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纯洁性。现在假设另一种情况,如果韩春雨发表的论文不是在全球顶尖期刊,发明的技术也是不疼不痒的普通技术……试问,谁会注意这样一篇论文呢?作者完全可以按部就班的靠这些论文提职称,拿项目,评教授,在学术圈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我看来,数以万计不疼不痒的论文正是仿真学术的大本营。

在我本人从事的生态学研究领域,情况更复杂一些。韩春雨事件爆出来之后,我曾经跟一些老师和同行讨论过:生态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好像很少听说哪一个研究者因为研究结果不可重复而被曝光,也很少听说哪一篇生态学论文因为数据不可重复而被撤稿。为什么呢?难道是生态学者比其他科学家在道德水准上更高、学术伦理上更自律?显然并非如此。更合理的猜测是,目前生态学研究的范式存在重大漏洞,很多生态学研究的结果本身是很难重复、甚至不可重复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重复性的研究没有新意,因此没有价值。对于已经发表的论文,几乎没有人主观上愿意去重复和检验前人的工作。相反,所有的研究者都要想办法与前人研究在某些方面有所差异,这样才能彰显新意,才能获得论文发表的机会。第二,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和环境互相作用构成的生态系统,是高度动态和异质性的复杂巨系统。如果研究者得到的数据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以找到很多可能的解释,例如物种不同、环境不同、时空尺度不同等。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提出的证伪理论,在生态学中其实是行不通的:生态学中没有类似牛顿定律那样的普适性规律,任何一个学说和理论都有大量例外,即使发现了一些反例,也无法证伪这些学说。将主观和客观因素结合起来,可以发现,生态学领域的很多论文,其研究结果是无法被重复和检验的。换句话说,生态学界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自我净化和纠错机制,这其实是学科发展还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

其实,学术共同体无法自我纠错的原因之一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想一想伽利略之前的物理学,在牛顿定律建立之前,物理学的很多实验现象也是互相矛盾,无法

重复检验的。但幸运的是,那时候的学术研究很纯粹,研究者的探索主要是个人兴趣驱动的,没有太多主观意愿来故意造假,生产仿真学术型的论文。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成为一种谋生手段,特别是在某些区域,科学共同体的自组织结构被打破,同行互评的纠错机制被弱化或扭曲。当论文数量成为职称晋升、年终考核、项目竞争的重要指标时,研究人员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下,要么发表、要么被淘汰(publish or perish),各种仿真学术的论文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也就不足为奇了。

简言之,从理工科角度看来,有没有仿真学术呢?看上去像学术,形式上也完美无缺,但没什么理论和实用价值的成果不在少数。原因就在于作者更看重发表带来的收益,并不真的在意研究的结果。董老师一语中的,仿真学术既无(新颖)论点、亦无突破、更无灵魂,仅仅是“研究者”养家糊口的一个谋利手段而已。

悲夫!

董云川:耿博士是个爱教育的理工男,而且“仿真”概念正好与他所从事的生态学科相关,请他参加笔谈,意在弥补我等文科科学人的视角盲点。从他的议论中我们看到:其一,仿真学术行为并非文科独有,理工亦然,当今中国学界的虚浮取向无非半斤八两;其二,此处所指仿真,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仿真。前者属于伪,后者属于真。很显然,他的学科视野及其观点丰富了我对本问题的判断,天地人事,各行其道,万千学人,乐此不疲,尽入彀中。然而,随着时空流转,真伪追究自现。

陈先哲:大学是家理发店——教学何以失真,科研何以仿真

1917年1月,刚刚到任北大校长一个多月的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演说中他特别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校长的这个著名论断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少高深之处——大学就是专于学术的地方。本来就天经地义嘛!如果用美国学者博耶相对宽泛的“学术”来定义,大学的学术不仅指科研,还应包括教学。

但一百年后重温这句话,似乎更能体现蔡校长的远见。当今大学当然还有人在研究高深学问,但是不是多数人都在研究或者试图研究高深学问,却又不见得。就像现在城市中的很多理发店一样,看起来还是在理发,但其业务却发生了迁移。

蔡校长的论断译成大白话放在理发行业就相当于说:“理发店应该是理发的地方。”理发店的核心业务是理发,相当于大学的核心业务是教学和科研,都天经地义。但是,当你现在随便走进一家规模较大、装潢讲究的理发店,你会发现情况已不仅仅如此。正如今天你踏入任何一所类似克拉克·科尔所说的巨型大学,你会立即发现——大学未必是做学问的地方,学术行为早已流变。现在的理发店业务多元,不但理发,还包括美容美体、产品销售甚至理财服务。大学职能亦然,从最初的教学,到科研与教学并立,再到与服务社会三足鼎立。

市场上有两种理发店:一种是传统的理发店,另一种则是核心业务发生了迁移的理发店。业务迁移创新的理发店通常比较大型甚至开设多家连锁店,美容美体成为

主体,理发通常只是招揽顾客的次要业务。追求利润最大化显然是店家的目标,因此常常对外实行会员制,以对顾客进行“捆绑”;对内实行激励杠杆,以刺激员工积极性。在这种机制刺激下,每个员工同时就是推销员,因为每说服顾客开卡,员工即提成甚多。当你走进这种理发店,流程里的每个人都会不断动员你办卡,因为后者利润更丰。但对理发而言,员工的专心与投入则大打折扣。

从理发店发展的模式中,可以看到激励杠杆对业务变迁的影响:如果激励杠杆过大,原来的核心业务就会迁移,甚至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大学的情况也很类似:教学本来是大学的核心业务,但现在很多大学只是依靠这种业务去光明正大地招生,而真正用力在做的核心业务,一是所谓的科研,二是美其名曰的社会服务。因为这两种业务,一种容易量化和进行排名,是大学排行榜的重要指标;另一种则可以创收,直接带来高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还天真地认为教学是大学核心职能的人,客户体验感就会很差,尤其当大学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之后。于是,大学的教学难免失真——不仅注入水分,失去真材实料;而且缺乏养分,失去真情实意。

与此同时,科研又何以仿真呢?科研看起来真是大学的核心业务啊!的确,当大学像转型的理发店一样,采用各种市场化的手段和锦标赛制的激励方式来提高科研产出的时候,科研明显变味了。与教学不同,大学科研要掏的不是学生的腰包,而是政府的腰包。政府作为各种科研项目的提供者和资助者,是所有大学全力争夺的金主。明摆着,几乎每所大学都在做课题申报动员,主动与主管部门或潜在评委搞好关系。尤其是重大重点课题,学校是三军劳命,“跑部钱进”,个人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学术锦标赛制下,职称晋升要看课题,学科排名离不开课题,学校排名更要看课题,课题成功地对各种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赤裸裸地捆绑。拿到课题后,常常是大老板抓小老板,小老板抓研究生,生产出符合结题规定的成果交差,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循环。所以真正的科研学术是什么并不重要,但像模像样、形式正确却十分关键。即便是顶尖学术依然摆脱不了被工具化的命运——从高被引排名、学科排名到大学排名,人们需要的只是一目了然、直截了当用最快速度筛选出结果,至于这些学术是什么和真正的贡献在哪里,早已无足轻重了。

当然,大学核心业务的迁移自有其合理性。为什么转型的理发店有竞争优势呢?首先,新业务指向潜在客户群,这个群体可以贡献更多的利润以支撑传统业务的低价,从而以价格优势招徕顾客。中国大学一直可以保持低学费大规模招生,正是类似的原因。其次,综合集成之后,店大牌大,让消费者有面子上的虚荣感,这也正是考生报考综合性大学的原因。最后,传统理发店的核心业务不好评价,很难说哪个理发师剪的头发更漂亮,都是各有所好,因此从具体业务里很难获得竞争优势,因此转型有其合理性。中国的大学也是如此,教学很难量化评价,专门院校或专事教学的大学通常很难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向综合型或研究型大学转型成为一致的趋势。

问题在于,当大学的核心业务迁移了,只剩下失真的教学和仿真的科研,还能称之为大学吗?就算勉强还能称为大学,但当所有的业务都用金钱、指标、排名来衡量,大学和世俗社会一样,都是只看东西,还能“无问西东”吗?

董云川：“青椒”陈先哲老师的比喻极有创意，理发店、核心业务、职能迁移，形象深刻，入木三分！沿着他的分析路径，显而易见：当今大学，教学对不起学生雇主，科研对不起政府雇主——客户体验感天翻地覆，指标高悬，数据攀升，无非伪高潮而已。“小雄”所见略同。当大学这样一个应该以灵魂作为指针的高堂圣殿，统统都位格化于金钱、指标和排名之后，学将不学，真作假时假亦真，最后也只能将其与理发店进行类比了。不是吗？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如若大学继续如此这般地生存下去，原本属性迥然相异的两者还真的可以归为一类，一较高低！

王佩佩：品读经典名著，细酌仿真学术

在2018年的高峰论坛上，听到董云川教授提出的“仿真学术”概念，引发了我对学术本真的思考。这到底是一个真命题抑或是一个伪概念？若是仿真，标准为何？何为真？何为仿真？如何甄别？如何规避？通过经典研读，深入反思，分享心得如下。

首先，仿真学术亦非空穴来风。“仿真学术”虽是伴随电子复制技术而生，但其隐含的特征却早已有之。自学人对学术探索伊始，便已看到了潜在的隐患。洪堡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中对学术展开分析时就曾提出过类似的命题，“显而易见，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组织的建立，务必遵守一条根本的原则，‘学术是一个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问题，当锲而不舍的探索之。’一旦停止了对学术的真正探索，或者认为学术无须来自精神深处，只需众多材料的堆积而成，那将是无可挽回的、永远的损失。不仅是学术的损失，因为学术长此以往将徒有其表；这也将是国家的损失……”^{[1][131]}从洪堡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在探讨真学术的同时指出了学术表面化的潜在危机，即那些注重形式、材料堆积，无视精神内核，徒有其表的学术，这也正是董老师所说的仿真学术。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英德美大学研究》中也表达过类似的学术危机，“大学现代化也会遇到我们所说的种种危险……真实之理念放任自流和技术得以发展之时，也即平庸之辈兴高采烈之日。学术从未免于迂腐和肤浅。现代世界一方面由于出版手段发达，一方面出于‘习得的’学位的过分钟爱，在假象肆虐面前痛苦呻吟。”^{[2][19-20]}弗莱克斯纳所说的“危险”、“真实理念放任自流”所致的“学术的平庸”、学术“假象”，都隐含了技术发展对学术本真的冲击以及仿真学术的浅显化与泛滥。

其次，了解学术本真的内在规定性是甄别仿真学术的前提。

一是学术目的：理性与道德。洪堡认为：“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本在于探究博大之学术(wissenschaft)，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1][132]}洪堡强调培养人的理性和道德，即培养所谓的完人。这些人一生都处于研究的过程之中，表现出对探索未知和真理的渴求^[3]。洪堡的纯学术注重精神和道德的修养，是发自内心且作用于内心的、可以改变人的道德和灵魂的科学。因而他认为，真学术是一个无法穷尽且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而仿真学术，也就是他所认为的徒有其表的学术，是无视内心的精神反思时产生的，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理性与道德。

二是学术路径：哲学习惯。虽然纽曼对于大学的职能的表述较为保守，突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知识的探索 and 发现，但从其对“哲学与科学”的相关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其对学术本质的认识：“一旦理智作用于知识，影响了知识，或者，如果可以说的更形象一点，渗透进知识，知识就可以被称作科学或哲学。理智是知识内在丰富性的本原。”^[4] 纽曼的科学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而知识是一种习得的精神启示或一种内在禀赋。从他的观点中可以看出，科学（学术）与知识的本质区别在于理智，知识的表达不光靠阐述，还需要推理，也就是自由教育所倡导的哲学习惯，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身思维习惯。他认为的科学就是要经过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

三是学术要求：独立性与无责任性。弗莱克斯纳强调把“闲逸的好奇”之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认为大学虽然是制度环境下的产物，但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只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不仅仅依赖于习惯，那么惰性和阻力也有其特定的用处。”^{[2]3} 他认为大学应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和训练学生。他指出，大学研究的问题是不管源自何方的，也就是说可以回应社会的需求，但必须是理智需求。他也强调学术的理智特征，“专业是学术性的，它的本性来自理智。”^{[2]11} 但他主张大学与现实社会保持接触，不需承担责任。

从以上对学术本质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术与仿真学术的区别在于内在属性根本的不同。

那么，仿真学术有规避之道吗？

学术不仅具有客观性与价值性，更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迁，仿真学术危机有增无减，化解危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教育体制经年累月地引导与规范。大学与学人应坚守学术的内在约束性及学术操守。洪堡指出：“无论政府如何为大学提供组织和经费支持，都会有损于学术；学术与外在制度和经费安排有本质区别，两者结合，必然有消极的后果，精神和高远之物必然坠入物质与低俗之境地。”^{[1]133} 因而，大学应坚守学术底线，防止行政化、市场化、大众化的干扰，注重学术的内在精神与道德修养价值，注重理智作用的发挥。弗莱克斯纳也提出：扭转这种倾向的关键在于大学，“必须记住大学靠的是思想，靠的是伟人……伟人是个人，个人与组织永远处于冲突之中。大学是一个组织。一方面，它不能混乱不堪；另一方面，其繁荣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否能够为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提供独特的、适宜的环境。”^{[2]19-20} 也就是说，大学应保持一定的孤独与自由，保证其灵活性，为学人提供一个自由探索的空间，保证思想的自由与学人的自在。

董云川：王博士选取了学理的路径对我的论题进行了回应。她试图从经典名著中寻找端倪，查找蛛丝马迹。看来文献里的确存有足够的佐证论据，可以证明我今天提出来的“仿真学术”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杜撰。其实，仿真问题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生物学概念，后者是演绎拓展出来的概念。本人所指是后者。沿着世界高等文明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我们“欣慰”地发现，教育史上有过仿真，西方有过

仿真,因此西方学者高人多少有过解析、警示与告诫。然而遗憾的是,现代高等教育并没有停止仿真的脚步,伴随着功利的筛选上位制度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仿真学术在中国当下的教育语境中大放异彩,愈演愈烈,不敢说绝后,一定是空前未有之格局。

胡艳婷:如何做到“真正的学术”?

“慢工出细活”落伍了吗?新自由主义力主市场经济导向,认为市场竞争原则才能确保效能并保证质量,市场逻辑需要成为社会运作的新信念。如今,随着学术市场愈加繁荣,学术的职业化倾向也愈发明晰,市场逻辑导向之下,“产出”和“效益”成为最主要的衡量指标,教师评职称、评奖评优、申请课题都需要以“研究产出”作为标的,没有产量和效益就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数量”相对于“质量”而言是显性指标,外界评价首先看到的是“数字”,而不是论著的“内涵”,花费数年的精力去做研究有可能成为一件很傻的事情,也许在成果孵化的过程中胎死腹中。如若失去组织和制度的支持,又没有外界的认可,自我的研究执着显然艰辛难耐。当今的学术生态并不支持深入和漫长的研究,沉下来、静下来的“慢研究”成为不合时宜的选择,短期内出成果、出效益的“快学术”成为成功的价值标杆。虽然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呼唤重返“工匠精神”,各行各业似乎也先后响应,但能否在快节奏时代得以践行,仍值得拷问。

戴着镣铐能不能演义“惊鸿舞”?原本是我笔写我心,我字释我情,现今却成了笔端跟着热点走,文字随着“范式”跑。研究生们在文章撰写前,必须先去看拟投稿期刊的选题范围是什么,文章风格如何,编辑有何偏好……权衡之后,方才开始着笔书写,严格按照期刊的隐性和显性要求,不越“雷池”,否则难免成为“瞎子研究”,文章只能盲投、乱投、海投,最后石沉大海。在这种导向之下,“如何发文章”要比“怎么写文章”的学问还大。初入学海的青年学子们打磨锐气,更关心研究自己的文章如何才能在高水平的刊物上公开发表,如何才能博人眼球引起公众影响,逐渐忽视了学理的积淀、深入的反思以及扎实的辩驳。好比一位年轻女子,紧随潮流装扮自己的外表,以为一袭华美的袍子傍身便可招摇过市、行走江湖,殊不知,外在的光鲜总会褪色,“热点”总会冷却,时尚更迭变幻莫测,唯有内在的、本质的、深层的意蕴才能够持久芬芳。在所谓“论文范式”、“研究热点”以及“期刊偏好”的桎梏之中,研究生们何去何从,自由起舞,沉稳执着,已然成为现实命题。

沿着老路能不能开创新大陆?研究开始的前提当然要看前人的作为。于是,“原创”和“模仿”之间就开始了微妙的纠缠。首先,阅读前人的著述,免不了先入为主。其次,独辟蹊径开辟“新大陆”需要勇气和风险担当,也许空耗时日,最后鸡飞蛋打。更进一步说,“模仿”和“抄袭”之间的纠葛更是无处不在。“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原创”被投机者奉为圭臬,他们认为反正“天下文章一大抄”,只要“抄”得不动声色,“抄”得技艺高超又神不知鬼不觉,就可成为“论文”高产者,继而在追求“短平快”的时代,踏上捷径,迅速获取功名。

作为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多么希望能够接受到真正的学术训练，不要过早被世俗的学术生态套牢。

董云川：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教育的社会形象是学者形象的集合。学生的想法、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其实很重要，因为他们才是学术的未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我们自然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师者，一代有一代的学子。“慢工出细活”不是传统的训导吗？如果师者不坚守，学子如何能够静心？如果象牙塔不提供庇护，师者又该怎样过上有尊严的学术生活？极目四方，“真实的一代”中的极少数变成了“抄袭的一代”，大多数演化为“仿真的一代”，细细想来，让人胆战心惊！

赵宇琦：从“仿真学术”的特点，迹索学术求真的途径

学术求真，非“仿真”之“真”，是真学术也。

学术是具有专业视角的系统性学问，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未知的创新活动。然而，“伪造”、“速成”、“仿真”等风波，在貌似庄严的学术氛围中却显得不太和谐，尤其是“仿真学术”真假难辨且危害颇深，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欲要以仿真学术的特点为突破口，探索“学术求真”的途径，可以从学术成果产生的几个阶段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和成果呈现、成果转化。

仿真学术的产生归因繁多，在社会供需配置过度依赖指标运作的的环境下，研究者异端的“学术动机”定然难辞其咎。学术动机的不纯是仿真学术产生的内因，也是“学术仿真”的直接原因。在高等学府，一些研究生忙于发表论文，以逢迎评优、毕业、就业的需求；部分教师囿于绩效、职称及名誉等，奔波劳累于项目申请，苦心经营于“学术制造”（而非“学术创造”）。更有社会上诸多领域的从业者，或为出名或为格调，或为各种无关学术发展的目的与之结缘。这类“貌合神离”的学术动机恰恰与学术发展背道而驰，对于“学术求真”更是流毒深远。如果从马斯洛的观点出发，动机的产生主要是“需要”和“刺激”两个因素的作用，那么正确且纯粹的学术动机，也应该是“研究者兴趣使然”或“学术发展需要”这类原因。

在研究过程和学术成果呈现中，仿真学术常常具有研究过程“程式化”、无创新、循规蹈矩，学术成果“文体化”、格式化、按部就班等特点。一般来说，科研成果主要以论文和专利等形式体现，而仿真学术的“速成性”决定了研究本身不具有学术领域的开拓能力和发展后劲。随着近年来学术参与者的人数剧增，大批量的“成果”横空出世并“跃然纸上”，部分学者对学术成果的盲目崇拜和对速成结果的殷切期待，让人们更关注照猫画虎的文本而非研究内容本身，一些内容为了引用而引用，仿照已发表的论文格式进行套用填塞，似乎发现了一条“以生存哲学来研究科学技术”的终南捷径。甚至于某些学者的研究过程则是直接通过论文表达来进行的，殊不知文本是呈现研究，而非缔造研究，过分关注文本而忽视研究本身反而是本末倒置。

学术成果转化，是将具有实际价值的学术成果进行后续的开发和应用等活动。基于上述功利性的学术动机、循规蹈矩的研究过程以及速成的“学术成果”所造就的

仿真学术,其内容价值寥寥,成果转化更是无从期待。事实上,学术研究贵在求真、求新、求深,研究的目的在于满足学者的探究欲求,在于助力学科知识的深度发展,在于学术成果对社会民生的良性促进。不考虑间接影响,学术求真归根结底是“学者”和“学术”两者之间的对接。不求我们的学者一定要有西南联大时期刚毅坚卓、贫贱不移的冰魂雪魄,只需他们是出于自身的求索或研究责任感而从事学术研究,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学术活动,把重心放在“研究内容”上,那么学术之“真”并不遥远。

董云川: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具有丰富多彩的伦理说教。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今大学的种种现象,无不深刻影响着徜徉其间的莘莘学子。一方面,我们明显地看到高等教育质量的危机显现,体会到生源质量的整体下滑趋势,也深切感受到研究生教育在毕业答辩时导师们把关的两难困境。无意中,对学生们所提交的毕业论文“放还是不放”(通融)的选择替代了“合格还是不合格”(严判)的决断。奈何如此?另一方面的逻辑关系很显然被漠视了,那就是同在同一条因果链上,老师们如何通过学术而获得进步,学科如何通过品质而获得上位,学校如何通过责任而获得社会认可!真的有真的活法,假有假的活法,仿真也有仿真的活法。正如评论家沈敏特所言:“如今有权的、有钱的,比有学问的人,出的书更多;因而,文化垃圾比文化精华更多。”怪谁呢?

参考文献

- [1] 陈洪捷,施晓光,蒋 凯. 国外高等教育学基本文献讲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2]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3] 周 川. 高等教育事理蠡测[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154.
- [4] 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节本)[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2.

(收稿日期:2018-03-10;编辑:荣翠红)